

关于中国大学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田正平 潘文鸯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近年来, 大学史研究方兴未艾。由大学组织的校史编写工作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其编写多是为了迎合校方的宣传需要, 成果多为通史性著述, 分析框架比较单一, 缺乏深度, 少有深入研究的成果; 学者个人的大学史研究起步较晚, 他们大多选择与大学史有关的某一专题深入研究, 其研究更多地受到近代史观变化的影响, 引入了社会生活史、政治文化史等研究方法和新的视角, 表达上也更自由, 产生了诸多佳作。大学校史写作应该把握住两条主线, 一是大学发展中学术与政治、学府与政府的关系, 二是学校体制、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学校经费、师生情况、课程设置、校园文化等影响大学自身发展的内部因素。紧紧围绕上述两条主线, 尽可能全面地收集、辨别、分析使用相关史料, 同时吸收比较史、计量史和口述史等领域的多种研究方法。

关键词: 大学史; 校史; 组织编纂与个人研究; 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8) 02-0237-08

大学史研究涉及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近年来,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一再张扬, 如何通过历史的梳理和重构来关照现实、展望未来, 这一问题吸引了不同学科的学者, 使其成为一个颇具人气的跨学科的学术热点。一些高等院校更把撰写校史作为挖掘资源、接续传统、凝聚士气、彰显特色的重大工程,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编写出版了各种类型的校史和相关资料文献。大学史研究可以说方兴未艾、成果迭出。

早在 19 世纪初, 西方国家就开始了大学史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 随着大学史专门研究期刊的创办, 西方大学史研究初步实现了制度化。^① 我国的大学史研究相对来说起步较晚, 且主要以校史编纂为主, 缺少经过专业学术训练的学者们的参与。最近 10 多年, 大学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除了校史研究者外, 越来越多的教育史学、历史学和高等教育学等领域的学者开始意识到大学史研究的意义, 并对大学史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提出思考和建议。^② 然而, 其中很少有学者对中国大学史研究的状况做出概括和分析。本文意在考察分析中国大学史的研究状况 (侧重有关当代中国大学校史的研究), 并进一步对大学校史写作做出些思考。

基金项目: 浙江大学文科教师教学科研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浙大发 [2017] 34 号)。

作者简介: 田正平,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中国教育现代化史、中外教育交流史; 潘文鸯,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专业方向: 中国教育史。

^① 沈文钦 《域外大学史研究: 制度化历程与学术范式变迁》, 《大学教育科学》2014 年第 2 期。

^② 这一类的代表性文章有: 王健文 《校史叙事观点的再思考》, 《新史学》2003 年第 14 卷第 3 期; 王学典 《大学校史与学术史的关联——读〈青岛海洋大学大事记〉》,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 6 期; 张斌贤 《关于大学史研究的基本构想》,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 年第 3 期; 胡端 《试论校方修史与私著校史的异同及互鉴——以研究模式与体例框架为例》, 《现代大学教育》2012 年第 4 期。

一、大学史研究现状

祖国大陆的大学史研究最初是以校史编纂的形式出现的,第一波浪潮大约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学恢复招生和四个现代化目标的重新提出,激发了一批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长期走在前列的大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校史纷纷面世。1984年《教育部关于编写校史的通知》进一步推动了各高校校史编写工作的开展。这一时期较典型的成果有《南开大学六十年1919—1979》(1979)、《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1981)、《清华大学校史稿》(1981)、《浙江大学校史稿上册初稿》(1982)、《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82)、《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1983)、《四川大学校史稿》(1985)等。这类校史的编纂出版与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以及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急需大批人才的大环境有关。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类校史又大多是一批急就章,缺乏丰富史料的支撑和深入的研究做基础。同时,由于出版于文革不久、改革开放之初,其编纂体例和叙述话语均具有较深的时代烙印,也存在着溢美之词过多、评价不够客观甚至夸大、演绎或隐匿部分史实的问题。以《北京大学校史》为例,有学者曾指出“其对蒋梦麟校长的评价过于苛刻……只从激进学生的立场出发,一味谴责校长的‘高压政策’,将其讥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①。

第二波浪潮大约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众所周知,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多所大学迎来自己的百年校庆之际,各校纷纷出版校史以“宣传”其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光荣的办学传统,为大学史研究的繁荣拉开了序幕。天津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所有这些创建于19世纪90年代的高等院校,都毫无例外地充分利用了百年一遇的时机开展校史研究,并催生了一批校史著作,^②如《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2卷(1995)、《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1996)、《浙江大学简史》第1、2卷(1996)、《西南交通大学校史(原唐山交通大学)》第1卷(1996)等。纵观这一时期的校史文本,与20世纪80年代的校史相比,由于受到近代史观变化的影响,在叙述框架等方面已有很大的不同,即“左”的思想的影响正在减弱。例如,1996年出版的《浙江大学简史》在叙述1949年前的校史时,用《竺可桢的教育思想及办学方针》一章,取代了1982年出版的《浙江大学校史稿》最后一章《中共浙大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党对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然而,这些校史著作大多缺少对大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内部制度和自身规律等方面的探讨和分析,对大学发展与外部关系的处理也较简单化。在撰写体例上,通常是以时间为纵向线索,以专题形式从横向展开,较为单一。有关大学发展诸多因素的展示不够全面,总体上给读者呈现的是一幅平面图景而缺乏立体感。

进入21世纪后,由各校组织编纂的大学校史的进度、安排,与各学校自己确立的“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或者设定的其他目标有更多的关联,完全成为一种计划性产品。《上海交通大学史》的编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2年,校史研究被该校确定为大学文化和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学校专门成立校史编纂委员会,由时任党委书记王宗光任编委会主任,并于当年年底被列为学校“985”二期工程首批重点A类建设项目;2006年110周年校庆前后编纂出版了20余种、总计2000万字的系列校史研究丛书;^③2011年115周年校庆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四卷《上海交通大学史》;2016年120周年校庆时则出版了后四卷。对于该书的出版,主编王宗光更是不吝指出,“创建

① 陈平原《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读书》2000年第2期。

② 北京大学并未在百年校庆之际出版校史,但是出版了《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1998)以及《北京大学史料》(共4卷,2001)等一批有分量的校史研究资料。

③ 马德秀《变革与超越——走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之路》,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10—412页。

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一流大学文化建设的支撑”^①。把大学校史的编写与一流大学文化建设的目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众多大学校史编纂的初衷和最大的动力。

与由大学校方组织编纂的大学校史相比较,由学者对大学史进行个人研究的学术现象在祖国大陆出现较晚。台湾地区学者苏云峰对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校史开展的独立研究则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已开始,^②出版的相关著作包括《私立海南大学1947—1950》(1990)、《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1996)、《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1998)、《抗战前的清华大学1928—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2000)。其中《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一书更是被史家何炳棣誉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部标准著作”^③。此外,台湾地区学者黄福庆的《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1988)、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1999)也具有一定影响力。苏云峰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通过对清华大学早期历史沿革的剖析,呈现出清晰的现代学术发展脉络;黄福庆的《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论述了中山大学人文社会学科的机构建制、教学方针、师资队伍等,并认为战前中山大学“能在国内大学中占一席之地”的原因在于“渐渐建立了它自己的学术风气与特点”^④;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在叙述北大国学门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考量了其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地位,并探讨了现代学术体制建立和发展的相关问题。以上著作不仅囿于对一所学校甚至一个院系的发展史的研究,而是小题大做,将一个院校的历史作为观察近代中国教育、学术发展乃至社会变革的一个窗口,“窥一斑而见全豹”。

海外学者的相关著作主要有美国学者Wen-hsin Yeh(叶文心)的*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1990)(中译本为《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2012)、Timothy Weston(魏定熙)的《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1998)^⑤、John Israel(易社强)的*Lianhu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1999)(中译本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2012)、Xiaoqing Diana Lin(林小青)的*Peking University: Chinese Scholarship and Intellectuals, 1898—1937*(2005)(《北京大学:中国学术与知识分子,1898—1937》,目前尚无中译本)等。其中,叶文心着力刻画了民国不同类型高校的不同文化风格和政治取向,及其在文化、社会和政治关系彻底重组的背景下,与主政者关系产生的疏离;魏定熙则运用了“政治文化”的概念,通过对北京大学早期历史的研究,探讨北京大学在中国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占有独一无二地位的原因;同样研究北京大学,林小青则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通过考察战前北京大学的历史,探讨在时代巨变(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民主、科学、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概念的涌入)中,大学如何反映并塑造中国思想文化,并讨论了北大“兼容并包”的精神及其对中西文化融合和西学传播的推动,以及现代学科的引进,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变;易社强在对西南联大校史的叙述中,展现了联大与云南社会以及当时政府之间的关系,探讨了联大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精神渊源,并描摹

① 佚名《上海交大举办“大学的责任、传承与创新”出版座谈会》,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网, http://jdxiaoshi.sjtu.edu.cn/dtbd_view.jsp?id=198。

② “我研究清华校史,自1970年迄今已四分之一世纪了”。参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自序第2页。

③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何炳棣序第1页。

④ 黄福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第191页。

⑤ 该书为作者博士论文,后经修改出版英文版*The Power of Position: Beijing University, Intellectuals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1898—1929*(2004),英文版的中译本为《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2015)。

了联大教师的风采,再现了联大在昆明时期的生活。

祖国大陆对近代大学的个人研究,首先从年轻学子们的学位论文选题开始,并持续发酵。以中国知网硕、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为例,笔者以题名为“大学”并且中图分类号为“G649.29”为检索条件,检索到从2001年到2017年间共有博士论文30篇,硕士论文144篇,且历年发表学位论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的一些成果,如王东杰的博士论文《政治、社会与文化视野下的大学“国立化”:以四川大学为例(1925—1939)》(2002)、许小青的《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以国家、政党与社会为视角的考察(1919—1937)》(2004)、孙宏云的《清华政治学系与中国政治学(1926—1937)》(2004)、蒋宝麟的《首都中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1927—1949)》(2010)^①以及刘超的《清华大学成长机制研究——政学互动的视角(1928—1935)》(2011)等均已成书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研究突破了传统狭义的“校史”研究视野,或立足微观、以小见大,或留意宏观比较、尝试跨学科研究,均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色彩。

二、对已有成果的分析

1. 组织编纂与个人研究

对某一特定大学的历史研究,一般被统称为院校史。^②如果按其作者身份和编写目的划分,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官方史”,即由有关院校组织或资助编写的大学历史。另一类则是学者个人出于学术兴趣或其他原因纂写的院校史。在大学史研究中,组织编纂与个人研究各有利弊。

校方组织编纂的有利条件是,有较充足的经费支持、时间和人员保障,有查阅相关档案和出版的便利。而上述的便利条件,也为其“史志兼修”的特点提供了保障。“史志兼修”,即资料先行,编研紧跟,或者校史编研与资料汇编同时进行。^③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山东大学、南京大学、暨南大学、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在编写出版校史的同时,收集、梳理相关的历史资料文献,并将其以校史资料选编等形式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为大学校史的研究和撰写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同时,其出版也为人们研究大学史以及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文化史、思想史等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外,校方组织编写的校史,其成果形式多为通史性,也为学界对大学史和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比较完整的个案。

当然,“官方史”的不利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校史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主题确立、视角切入、史料选取、论说评价等,其研究性和学术性总是与传主的期望之间充满张力,学术水平和宣传效果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学校官方的高度介入、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以及现实政治的影响,使得自由研究、自由表达困难。这种条件下编写出来的校史,虽能在陈述时做到面面俱到,但其分析框架往往千篇一律,无法挖掘出学校自身特色;在牵涉对相关的人与事的政治评价等敏感问题时,多采取“宜粗不宜细”的撰写原则。这样做的结果虽能使校方免去许多烦恼,也使校史研究浮于表面,不够深入,对影响大学发展的关键性问题的分析和规律的揭示很难有所贡献。有些校史成果尽管印刷精致、装帧华丽,但叙事模式单一、书写文字乏味,很难激起读者的兴趣和思考,它们的功用很可能限于橱窗里精美的陈列或是书架上用于装饰门面的摆设,沦为一种“形象工程”。

^① 蒋宝麟的博士论文是其在香港中文大学完成的,但该选题为延续其在南京大学硕士论文《抗战期间内迁重庆的中央大学》,故将其归在此处。

^② 张斌贤曾对大学史探讨范围作出分类,认为其包括大学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区域史、专题史、院校史六个方面,并指出,很多大学史研究“往往是在两个或多方面的交叉点上进行的,例如国别—断代研究、国别—专题研究、区域—断代研究、区域—专题研究、院校—断代研究、院校—专题研究以及国别—断代—专题研究等”。张斌贤《关于大学史研究的基本构想》,《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年第3期。

^③ 胡端《试论校方修史与私著校史的异同及互鉴——以研究模式与体例框架为例》,《现代大学教育》2012年第4期。

个人研究往往选取某大学发展进程中的某一时段、某一人物或某一科系、某一事件等作为对象,以便深入展开和挖掘。这些研究更多关注大学与社会的互动,力求淡化意识形态、现实政治的影响,表达比较自由。如王东杰的《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2005)研究了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进程,以此展现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大学以及地方观念与全国观念等各种关系的复杂面相;牛力的《罗家伦与国立中央大学》(2015)通过对罗家伦执掌中央大学时期的研究,展示国家建设与近代中国大学治理中的复杂关系;孙宏云的《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2005)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为切入点,从具体的学术史事中揭示中国现代政治学展开过程的渊源脉络。平心而论,阅读这些著作往往能引发读者的思考,激发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2. “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改革开放以来,就历史研究这一大的领域而言,变化最大的是近代史观的重新确立。大学史的研究也受到了主流史学范式变化的影响,校方编纂与个人研究的分析框架和关注视角逐步发生变化。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校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革命史”叙事框架的影响,以致将其研究思路乃至具体结论直接移植到大学史的写作中。以该时期同类著作中较有影响的《北京大学校史》为例,第4—7章的章节标题分别为“北京大学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准备和进行时期”“北京大学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性内战前夕”“北京大学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样的分期使大学在其历史中完全丧失了主体地位,沦为政治史或革命史的附庸。

的确,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史,与中华民族一个世纪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奋斗史,是紧紧地胶着在一起的。事实上,它们的创办和产生,本身就是挽救民族危亡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代大学的成长、发展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不同时期政治文化的烙印。离开了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奋斗史来研究、讨论和书写某个大学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现代大学作为培养人才、推动科学进步、引领社会发展的高等教育机构,它的成长、发展,又有其特殊规律。如果不注意这种区别,把它们的成长发展完全与社会的变革亦步亦趋地等同起来,恐怕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对大学历史进行分期,需要依照大学自身的历史纹理,指出其真正的历史关键转折处,“让每一时期具有明确的‘特色’,能有别于其他不同时期;抽刀断水,探寻出学校历史‘变’之余,又能钜视地鸟瞰学校历史长河在曲折蜿蜒下不变的‘常’”^①。例如,对于交通大学1949年前的历史分期问题,校史编写者们注意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交通大学校名的变更及其从清末到民国隶属领导部门的多次变化,唐文治等校长的办学思想等因素,都对交通大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需要在校史分期时被考虑。^②最终,八卷本的《上海交通大学史》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四卷,按“南洋公学(1896—1905)”“创建近代工科大学(1905—1921)”“建成理工管结合的工科大学(1921—1937)”“战争环境下坚持办学(1937—1949)”划分。显然,学校的性质和办学环境的改变是其划分学校历史的主要依据。的确,校长任期的更迭、学校隶属的变动固然是学校历史中的重要变化,但是在选择与裁定校史分期时,“为学校带来真正重大的改变”的才是最为合宜的切割点。

此外,在具体内容的叙述中,早期的校史为了突出其某种“形象”,适应彼时彼地的政治需要,将学生运动史、抗日战争史等表明爱国、革命的内容,作为校史写作的一大重点。除《北京大学校史》外,同一时期的《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在采用革命史分期的基础上,几乎在每个章节都专辟一节来论述学生反帝、反军阀、抗日救亡、反内战等爱国运动,篇幅比重约为全书的三分之一。很多学者对这种在校史编写过程中将重心过多移向革命史、政治史的现象颇有微词。例如,苏云峰曾

① 王健文《校史叙事观点的再思考》,《新史学》(台北)2003年第3期。

② 陈贻芳《用历史的科学的态度写好校史》,载王杰主编《学府史论》,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28—329页。

批评“如果把学生政治性运动作为大学校史的主要内涵,则完全扭曲了教育史的本质与意义。”^①

与官方校史的编写者们相比,个人学者则先行一步,他们更早地受到近代史观变化的影响,在大学史研究中淡化了传统的革命史观叙事模式。早期的代表性成果有陈平原1998年的《老北大的故事》。该书通过记录名人轶事,勾画出另一种意味的校史,读起来令人兴致盎然,十分受欢迎。而进入21世纪后,如前所述,众多学者在大学史研究中引入了社会生活史、政治文化史等研究视角,除一批博士论文外,尚小明的《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2010)通过讲述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的历史,探讨了北大史学系的教育与学术传统,及其在近代中国史学教育和史学学术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做出的贡献。

当然,“官方史”的编纂者们也对这种变化主动地做出了回应和调整。他们积极借鉴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并产生了一些佳作。例如,王德滋主编的《南京大学百年史》(2002)在分期上按照南大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编、章的划分,而各章的小结则按主题划分,兼顾到人物思想、学生生活、机构设置、学术研究、重大事件等各方面,资料丰富、结构合理、史论结合、重点突出,是一部体现了较高学术水平的大学校史佳作。

目前在大学史研究中,通史性的校史绝大多数为官方组织编纂,在研究性和学术性上有所不足;学者个人的大学史研究则多为与校史相关的专题史研究,能够对有关大学校史的某一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挖掘和透彻的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专题史研究能够取代通史性的校史,也不意味着官方组织编纂的校史就注定不能具有较高的学术性。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思想观念的转变,特别是随着人们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变迁的重新认识,以及对校史本身功能认识的不断提升,真实地再现历史、客观地评价过去,资政育人、以史鉴今的史学观,正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改变着校史编写的面貌,一些新近出版的校史著作在学术性上有了较大的提升,而学者个人开展的相关专题史研究,选题视角日益多元,对史料的发掘更加深入。事实上,一部优秀的通史性大学校史的完成,也必须建立在对各重要专题进行充分探究的基础上。现有大学校史编写质量不高,部分原因即在于缺乏大量专题研究的支撑。组织编写与个人研究通史性校史与专题性大学史,应该相互支持、携手并进。

三、关于大学校史写作的思考

从世界范围看,大学史研究的繁荣部分地是由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所推动的。世界各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间点不同,大学史研究的兴起也有先后。中国于2002年达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目前正在经历着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推进和努力实现高等教育“双一流”的进程中。这个进程既需要以更加开阔的眼界和胸襟吸纳世界各教育先进国家之长,也需要从我们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传统中汲取营养、总结教训。大学校史的编纂、大学史研究的充分开展,研究中国现代大学百年来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正逢其时。

针对我国目前大学校史编写研究的现状,我们认为,下面几个方面需要特别地予以强调。

大学校史毕竟是一部“史”。作为史学著作,当然需要正确的史学观的指导,需要科学的、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框架,更需要全面的、丰富的、真实的史料的支撑和各种有效方法的借鉴使用。

首先,要全面、客观地呈现大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就中国现代大学而言,这种关系具体地体现为学府与政府、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具有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以维护其学术研究和教学自由的历史传统。因此,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学术中立等原则历来受推崇和标榜。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

^①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前言第4页。

大学发展的历程昭示我们,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大学与社会的互动,与政府和政治的关系远不是那么泾渭分明。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大学从产生之日起,就与政府、政治结下了难解之缘。不要说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是在强烈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在光绪皇帝三令五申的催促之下才得以实现的,就是天津中西学堂(天津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和浙江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的创办,虽然站在前面宣传呐喊、亲力亲为的是盛宣怀、廖寿丰们,但是没有清廷的支持,中国近代最早一批现代大学的雏形肯定会胎死腹中。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更是如此。大学作为汇聚知识精英、推动生产力进步、引领社会文化的重要场所,始终是政府和各方势力的重要关注点,它们都千方百计地将触角延伸到大学校园内,争夺大学的人才和资源;而落后的经济、动荡的社会,以及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紧逼,也使大学的师生们义不容辞地主动参与到民族救亡和国家建设中,与民族共命运、与国家共存亡。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中,大学疏离不了、更摆脱不了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态,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往往受到国家意志和党派观念的挤压。

平心而论,政府与大学、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并不总是负面的,一所大学的成长离不开政府在经费、政策等各方面的支持,而中国的现实是,1927年以后,“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政治框架经历了从确立到衰败的完整过程。在近代中国,一所大学要想取得较好的发展机遇,往往并不在于物质基础和地理位置的优势,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如何正确把握政治和学术、政府和学府之间的关系。大学要办得好,不能一味地与“政治”“政党”“政府”划清界限,千方百计地摆脱政治的困扰与干预,来保持大学的“独立”“清高”;而应该在坚持理想、原则的前提下,积极而有效地化解政治因素的负面影响,协调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充分调动和利用政治资源,整合各种力量,来为大学的发展提升内、外部空间,以实现大学的理想和抱负。^①研究和编纂大学校史,就要如实地呈现这种关系,不能以学校在某一时期或某一校长任内与政府、政治甚至政党关系的密切或疏远作为我们取舍材料、评说历史的依据,而应该以这种关系是促进还是促退了学校本身的发展作为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换言之,要全面、客观地呈现大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其次,牢牢把握体现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这一主线。

作为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大学的发展除受外部因素的制约外,还受内部因素的限制和影响,即是在大学校史撰写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学府与政府、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这一线索而外,同样要体现的是高等教育规律的制约和影响这样一条主线。学校体制、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经费配置、教师队伍、学生情况、课程设置、环境设施、社会服务、国际交往、校园文化,等等,当然更包括校长的更迭,这些大学发展中最重要内部因素应该是一部大学校史必备的重要内容。作为一部丰富而翔实的大学校史,应该具备一种可查阅的功能。很难设想,这些最基本的体现一所大学特色的因素缺失后,这部大学校史还有多少可资借鉴的价值。

如前所述,早期的大学校史研究对于学生运动着力颇多,相对忽略了大学传播知识、发展学术、培育人才的根本特征,使大学校史成为“加挂教学和科研的‘学生运动史’”^②。诚然,学生是大学校园中重要的成员,学生运动是近代大学发展中极具特色的一部分。对学生运动的研究有助于考察大学与国家政权、地方社会的互动,为研究高等教育与外部社会发展的关系提供独特的视角。但是,正如苏云峰指出的,学生运动毕竟“是校园管理失序时的一种活动,它所造成的校园对抗和不安,绝非校园之福”。非常态的学生运动的确应该被记录在校园生活中,但日常的校园生活更是了解“学校

① 田正平《“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从〈竺可桢日记〉看一位大学校长的精神境界》,《高等教育研究》2016年第4期。

② 陈平原《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读书》2000年第2期。

的创校精神和学风所在”^①。

大学校史毕竟是有关“大学”的历史，要体现大学本身的特点。在大学校史的写作中，要将关注点放在“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这一主线上，即大学如何在管理体制、经费运作、学制课程等方面总结规律，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规章制度，不断地适应社会发展，不断地汲取国际上先进的理念和方法来促进学校发展。大学校史研究一定要牢牢把握这一条主线。主线的存在、发展、壮大才使大学成为大学，如果离开主线，过多地关注非主流的事件，就会使大学校史研究偏离其原本的学术追求。

最后，紧紧围绕上述两条主线，尽可能全面地收集、辨别、分析使用相关史料，同时吸收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研究历史必然要从史料出发。全面地收集有关大学发展的史料，并认真地分析、辨别这些史料，是解释分析问题的基础。然而，对史料的选择这一行为本身就暗含着作者的观点。正如 E. H. 卡尔 (E. H. Carr) 所言“事实就像在浩瀚的，有时也是深不可测的海洋中游泳的鱼；历史学家钓到什么样的事实……主要还是取决于历史学家喜欢在海岸的什么位置钓鱼，取决于他喜欢用什么样的钓鱼用具钓鱼——当然，这两个因素是由历史学家想捕捉什么样的鱼来决定的。”^② 在校史写作中，如果对上述两条主线的认识和把握十分明确和自觉，就会大大拓展收集史料的范围，提高鉴别和使用史料的能力。许多从前被舍弃、被屏蔽的史料可能获得了新的意义，而过去被大量引证的史料则可能会被淡化，甚至成为多余而被删除。

大学校史的写作，在全面把握史料并对其进行充分利用的同时，也需要借鉴社会史“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及其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注重跨学科研究，打破学科之间的隔离，吸收更多的研究方法，如采用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等领域的方法。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可以对大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关键人物、管理制度、学术群体等进行对比研究。例如，叶文心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比较了京沪两地大学不同的办学风格、校园文化。当然，比较既可以是不同地区间的，也可以是限于同一大学内的。计量史学的方法则可以运用到涉及“大学与社会流动、大学的经济和财政、大学与政治宗教势力、大学中知识和思想的发展等”研究领域，对大学史研究具有拓展、勘误等功能。^③ 例如，苏云峰通过对 1924 年清华学生家长职业统计的分析，发现《清华大学校史稿》中这一时期的清华学生“多数出身于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其中有些还是大官僚大买办的子弟，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是少数”这一说法不够精确，认为较为正确的结论应为“清华学生大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以上的家庭”^④。口述史的研究方法通过访问曾在历史现场亲身体验过的不同身份、立场的见证人，获得不同角度、观点的信息，并弥补文字史料没有记载的内容。在大学史的写作中，通过访问大学的教师、学生、学校管理者、参与者等，可以使历史变得更加鲜活而有温度，大大增强作品的可读性。易社强在写作《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时，就曾访问过一百多位西南联大的学生和老师，并在书后附录了访谈清单。

责任编辑：朱志峰

^①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第 213—214 页。

^② 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108 页。

^③ 王璞、于书娟《历史计量方法在西方大学史研究中的应用——基于〈大学史〉杂志的分析》，《高等教育研究》2013 年第 3 期。

^④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第 209—211 页。

ing the Wei-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 and later extended to the south and even all China by the Tang Dynasty. American Sinologist , Berthold Laufer denies the coming time of pomegranate to China in the third or the fourth century. Pomegranate , apart from many practical values , also enjoys rich similar cultural implications in different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in its good connections with auspiciousness , harvest and fertility. In Chinese literature , it has become a rhetorical device for the literary scholars to express their emotions by depicting pomegranates. Thus , this introduced species has become a cultural symbol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Western “Cosmopolitan Literature”

Qiao Guoqiang (173)

The so-called “cosmopolitan literature” is a term derived from the concept of cosmopolitanism , namely , the author employs various literary devices to depict a group of literary characters and represents a series of stories that are fit in with the human spiritual aspiration and their aesthetic pursuit on the basis of “cosmopolitan imagination”. In such kind of literary works , there might be two varieties: (1) advancing universal humanism; (2)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reconcili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human beings. In brief, “cosmopolitan literature” is kind of utopian concept that arises in the globalization. Its ultimate aim is to integrate the nations and peoples in the world and therefore , to make up an integrated world literature. In this sense , the two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literature are cosmopolitan and nationality.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University History

Tian Zhengping , Pan Wenyang (237)

Studies on Chinese university history is going on well in recent years. Compiling work organized by the university officials started from the 1980s , with the purpos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university’s publicity. However , most of them are general history works with a simple and shallow analytical framework , fewer of which are exceptions as in-depth studies. In contrast , such studies by individual scholars started later with a focus on a special relevant subject followed by deeper and further investigations. Influenced by the modern research paradigms , individual scholars introduced new research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from political and sociocultural sciences and relatively more freedom of expressions into their study , which , as a result , brought about more better outcomes. Two major lines should be followed in university history writing , the former l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tic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and government; while the other linking the internal factors in terms of the university’s system ,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 scientific research , expenditure , faculty and students , curriculum and campus culture that are important in its self-development. Accordingly , broadly collected data should be classified and analyzed in detail , with consideration of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 , e. g. comparative , quantitative and narrative methods.